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

主编 瞿林东

宋史 研究

SONGSHI YANJIU

第八卷

分卷主编 © 罗炳良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第八卷

宋史研究

SONGSHI YANJIU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史》研究/罗炳良编.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1
(20 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瞿林东主编)

ISBN 978 - 7 - 5000 - 8007 - 7

I. 宋... II. 罗... III. ①中国 - 古代史 - 宋代②宋史 - 研究 IV. K244.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7362 号

- 责任编辑 郭银星 王亦妮
前期统筹 劳雅路
封面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037
电 话 010 - 88390671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8.75
字 数 390 千字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00 - 8007 - 7
定 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总序

瞿林东

在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二十四史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称为“正史”的缘故。它们的重要和价值,是由其内容所决定的。唐初史学家撰写的《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小序,回顾了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东汉史官著《东观汉记》、陈寿著《三国志》等撰述活动后指出:“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又说:“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①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一,正史是依照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的体裁即纪传体所撰写的皇朝史,或称朝代史;第二,除《史记》上记轩辕、下迄汉武是一部通史外,《汉书》记西汉历史,《东观汉记》记东汉历史,《三国志》记魏、蜀、吴三国历史,多以“世代”断限而述其史事,所谓“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就是这个道理。这是“正史”的两个基本特点^②。

① 《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正史类,中华书局1973年版。

②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著《史通》,把编年体皇朝史(朝代史)也列为“正史”,但后世少有遵循者。参见《史通·古今正史》,清人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从上引《隋书·经籍志》来看，“正史”之说当先于隋朝。据《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著录，有南朝人阮孝绪所撰《正史删繁》94卷，似是有关正史删削而成。这是目前所知“正史”之最早的称谓。《隋书·经籍志》以下，“正史”之名历代相沿，直至清代。清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称：“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①四库馆臣把“正史”看作历代历史著作的“大纲”，认为其余14类或是“参考纪传”，或是“参考诸志”，或是“参考论赞”，尽管这一见解并不十分准确，但可以表明“正史”在诸种史书中的崇高地位。

20世纪伊始，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倡导“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对历史学的变革和走向近代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梁启超在讲到“中国之旧史”时认为：“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他还说：“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这一看法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广泛的影响。但是，梁启超对二十四史的这个评论是不正确的，其所造成的影响也是负面的。其实，到了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自己已经改变了对二十四史即历代正史的看法，他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史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版。

讲到“人的专史”时说：“自从太史公作《史记》，以本纪、列传为主要部分，差不多占全书十分之七，而本纪、列传又以人为主。以后二千余年，历代所谓正史，皆踵其例。老实讲起来，正史就是以人为主要的历史。”“专以人为主要的历史，用最新的史学眼光去观察他，自然缺点甚多，几乎变成专门表彰一个人的工具。许多人以为中国史的最大缺点，就在此处。这句话，我们可以相当的承认：因为偏于个人的历史，精神多注重彰善惩恶，差不多变成修身教科书，失了历史性质了。但是近人以为人的历史毫无益处，那又未免太过。历史与旁的科学不同，是专门记载人类的活动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伟大活动可以使历史起很大变化。若把几千年来中外历史上活动力最强的人抽去，历史到底还是这样与否，恐怕生问题了。”^①这个说法同《新史学》对二十四史的说法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之所以引用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讲的这番话，是为了说明梁启超并不是一个固执的史学家，他是一个能修正自己的某些不恰当见解的史学家。同时，我们引用梁启超的这段话，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时至今日，也还有一些对二十四史抱有偏见的人，其中或许有人就是受到梁启超早年看法的影响。

当然，二十四史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在历史观方面，因时代的局限和作史者立场、观点的局限，还有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的局限，因而产生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是，二十四史决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也不是世界上“空前绝后的相斲书”，而是中华文明演进、发展的伟大记录。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第18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我们应当怎样看待二十四史,如何评价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中国史学对世界史学的卓越贡献,是人类文化工程中的一个罕与其匹的奇迹。

二十四史的撰写,上起西汉司马迁著《史记》,中经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历代纂修,未曾中断,各朝正史,代有所出,下迄清代官修《明史》,前后连续一千八百多年,历代史家、史官笔耕不辍,成此系列的浩大工程,这在全世界的史学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二十四史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明朝灭亡,上下近五千年中国历史进程,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面貌,反映了中华文明之连续不断发展的伟大轨迹,这在世界史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二十四史作为纪传体史书,是以记述历史人物活动为主,同时记述了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及有关典章制度等多方面内容,实质上是古代的一种综合体史书。这种综合体史书,是古代史学家用以全面反映历史进程、历史面貌的最好形式。清代四库馆臣把“正史”称为“大纲”,把其他十四类史书看作是参考“正史”中的纪传、诸志、论赞而作,固然不恰当,但从中可以看出“正史”之全面反映历史面貌的特点和价值。

二十四史记载了大量的、社会各阶层或不同群体的历史人物,显示出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中心位置。恩格斯针对欧洲的历史这样说过:“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

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①二十四史虽然也时时讲到“天命”,但它客观上都是记述人的活动,它所展现的,正是无数历史人物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道德、智慧等留给后人的启示。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②这就是一种启示。江泽民指出:

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③

这是更高境界的、更加深刻的启示。这种启示,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要之,二十四史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时代局限性,但它的积极方面的历史影响却是无限的和永恒的,因为它是我们为之自豪

^①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0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第1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信》(1999年4月25日),《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的中华文明的光辉记录。历史学家顾颉刚在 1935 年指出：历代正史“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①。史书重在“事实”，正史既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这是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评价。另一位历史学家白寿彝在 1981 年曾对二十四史做了这样的评价：“二十四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思想资料，留下了观察历史的方法，留下了写历史的方法，留下了许多专门知识。从历史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很多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还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②这可以看作是对二十四史的全面的评价。

四

在 20 世纪的百年中，中国几代学人对二十四史做了广泛的研究和精心的整理，也可以说是研究中有整理、整理中也有研究，二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其所得者专著以百数，论文则以千计。

以研究而言，至少包含考证和评论两种类型。前者如范文澜的《正史考略》，杨树达的《〈汉书〉窥管》，陈直的《〈史记〉新证》、《〈汉书〉新证》，陈垣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冯家昇的《〈辽史〉源流考与〈辽史〉初校》等，都是名著；后者如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和风格》、季镇淮的《司马迁》、白寿彝的《〈史记〉新论》、安作璋的《班固与〈汉书〉》等，亦皆佳作。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精彩之作，更是不胜枚举。考证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考镜源流，正其讹误，有助于人们的阅读和研究。范文澜在《〈正史考略〉绪

① 顾颉刚：《二十五史补编·序》，开明书店 1936 年版。

②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史学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

言》中这样写道：“《四库》区分群史，首曰正史，即糅合私修官修之二十四史而成者，次曰编年，曰纪事本末，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曰史评，凡一十五类，而正史为之大本。兹编所述以正史为境域，过此以往，则非日力所及，不复赘述。考四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清乾隆时增《旧唐书》、《旧五代史》、《明史》为二十有四。浩兮汗兮，非旦暮所得遍读也。文澜偏陋，未尝学史，然窃观前儒著述，或考源委，或正得失，美言可善，示我周行；窃欲九杂旧闻，缀为一编，他日翻阅正史，此或为其一助云。至于耳目所囿，遗落滋多，琐碎考证，例不具举。大雅君子，傥不我遐弃，幸复有以教正之。”^①这里说的“或考源委，或正得失，美言可信”，就是作者“考略”的旨趣，即“他日翻阅正史，此或为其一助”，此系“考略”者之良苦用心。

白寿彝在评论《史记》一书是“空前的巨著，优秀的楷模”时写道：“《史记》这部通史在它所包括的时代上，在丰富的内容上都是前无古人的。书中写贵族的很多，写平民的也不少，这是二十四史里的其他著作比不上的。司马迁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就能不仅记载上层，而且也记载下层人物；不仅记载统治集团的人物，而且也记载被统治阶级的人物，说明他的眼光是比较远大的。这一点和以后的史书比起来也是很突出的。《史记》里面不仅写男子，还记载了妇女当中比较出色的人物，如聂政的姊妹，王陵的母亲，虽没有为她们专门写传记，但写得很突出。在写妇女历史方面，

^① 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2卷，第1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司马迁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史记》不仅写汉族,还写少数民族。他写了南越、东越、西南夷、匈奴等列传,并且不是把少数民族放在末尾,而是和别的列传穿插起来,按历史顺序编排。此外,《史记》不仅写中国,还写当时接触到国外情况。就是这样,司马迁把他当时能收罗到的材料和书面上见到的东西,都利用起来,写成了一部从远古传说时期到汉武帝时期的通史,包括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妇女、少数民族和有关的外国。从内容的丰富、包含时间的长远来看,《史记》确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巨著,是后来史家的优秀楷模。”^①这一段文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把作者多年研究《史记》的心得都表达出来了,人们从作者的这些认识中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史记》的伟大。

至于整理,主要也包含了这两个方面,一是汇集前人的研究成果,二是精心点校。前者如顾颉刚主编的《二十五史补编》,后者如张元济等在二三十年代之校《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集众多学者点校二十四史,都是浩大的工程而有大益于学林。

《二十五史补编》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史学家们之所以要致力于这一工程,是因为:“历代史书里头,表谱书志未必齐备;那原有这些门类的若干史,又往往因为当时作者的疏忽以及后世传刻的错误,引起读者的憾惜。历来的史学家弥补这种缺失,做了许多的工作。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类。一是补作的工作,像钱子文作《补汉兵志》、郝懿行作《补〈宋书·食货志〉》等就是。二是校正的工作,像王元启作《〈史记〉月表正讹》、汪远孙作《〈汉书·地理志〉校本》等就是。三是考订的工作,像梁玉绳作《〈汉书·古

① 白寿彝:《〈史记〉新论》,第74—75页,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

今人表》考》、姚振宗作《〈隋书·经籍志〉考证》等就是。”^①正是为了弥补这一“憾惜”，编者搜求丛书和稿本，荟萃了上述三个方面的成果，定名为《二十五史补编》，与二十五史相辅而行。七十多年来，此书对历史研究发挥了重大作用。张元济在《校史随笔》序文中说：“曩余读王光禄《十七史商榷》、钱宫詹《廿二史考异》，颇疑今本正史之不可信。会禁网既弛，异书时出，因发重校正史之愿。闻有旧本，展转请托，就地摄影。影本既成，随读随校。有可疑者，辄录存之。每毕一史，即摘要以书于后。商务印书馆既覆印旧本行世，先后八载，中经兵燹，幸观厥成。余始终其事，与同人共成《校勘记》百数十册。文字繁冗，亟待董理。际兹世变，异日能续印否，殊未敢言。友人傅沅叔贻书，属先以诸史后跋别行。余重违其意，取阅原稿，语较详尽，更摘如干条用活字集印，备读史者之参证。管蠡所及，詎敢望王、钱二子之什一，亦聊师其意而已。”^②以十余年的工夫，“与同人共成《校勘记》百数十册”，就是为了“备读史者之参证”，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是一种什么动力？这除了说明二十四史的极其重要的地位，除了说明校史者对二十四史极其敬重和热爱，恐怕没有别的原因了。作为读者，要真正体会到校史者的这种甘苦和心境，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以中华书局为依托，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和许多高等学校的学者们共同参与对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史学界完成的一项大规模的史学遗

^① 《二十五史补编刊行缘起》，载《二十五史补编》第1册书首，中华书局1955年版。

^② 张元济：《校史随笔》，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产整理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在周恩来的支持下还是顺利地完成了。可以说,当今的任何一个史学工作者,以及众多的史学爱好者,都会深切地感受到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对自己的重要。甚至可以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史学工作者,都是在阅读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中一步一步走向史学殿堂的。正如参与点校工作的史学家唐长孺、陈仲安所说:“二十四史是一部重要的史籍,选择一种较好的版本,照原样重印行不行呢?我们认为,那样做很不便于读者。古书既无标点,又无断句。由于句读不明而引起的误解屡见不鲜。特别是到了近代,语言文字、名物制度的变化很大,现在的青年阅读二十四史,实在是困难重重。即使中年以上有过阅读古汉语训练的人,也要花费很大气力才能读懂。各史流传的版本,都有不同程度的错漏,给阅读造成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所以,花一番工夫整理二十四史是必要的。标点便是这种工夫之一。我们按文义划分段落,区分句读,让读者易于理解。在人名、地名、书名旁加上标线,使读者易于识别。把一连串的官称、爵号、器物名称用顿号隔开,以利读者区分。把书中引用的古书、成语、文章、讲话加上引号,使读者明了。这样就使读者省出一些推敲文字的时间。”^①这些话,讲得很具体,也很中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人如今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对此当有深切的体会。二十四史点校本对于推进历史研究的发展,推进历史知识的传播,推动历史研究人才的成长,其功可谓大矣。

^① 唐长孺、陈仲安:《点校本为读者提供方便》,见《整理二十四史工作的感想和体会》,《光明日报》1978年6月1日。

五

20 世纪的几代学人,用他们的勤奋、心血、智慧和对于二十四史的尊崇与挚爱,为后人留下了数以百计的研究专著、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在二十四史的研究和整理的历史上,书写了光彩夺目的一页。为了总结这份珍贵的学术遗产,推动关于二十四史的深入研究,促进二十四史的广泛传播,扩大中华文明的影响,我们从数千篇研究二十四史的论文和文章中,精选出一部分,汇集成书,定名为《20 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予以出版,供史学工作者和广大的史学爱好者阅读、参考和研究。本书凡十卷:第一卷《20 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综论》,第二、三卷《〈史记〉研究》(上下),第四卷《〈汉书〉研究》,第五卷《〈后汉书〉、〈三国志〉研究》,第六卷《〈晋书〉、“八书”、“二史”研究》,第七卷《新旧唐书与新旧五代史研究》,第八卷《〈宋史〉研究》,第九卷《辽、金、元史研究》,第十卷《〈明史〉研究》。

本书各卷主编在搜求有关论著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时间的限制和文献资料的分散,难以求全,因而遗漏在所难免,应该收录而未能收录的情况也是可能出现的。对此,希望读者批评、指正,并给与谅解和帮助,以裨将来再版时有所改进。

2007 年 9 月序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前 言

《宋史》是元代史家撰修的一部纪传体断代皇朝史,记载了北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南宋帝昺祥兴二年(1279)共计320年的历史。它不仅是现存二十四史中篇幅最为巨大、卷帙最为浩繁的一部史书,同时也是后世评价褒贬分歧最为明显的著作之一。由于《宋史》自身内容之丰富和历代学者研究成果之众多,致使它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一 元代史家对《宋史》的撰修

两宋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折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尽管后世研究者多认为宋承唐制,实际上宋代和唐代相比,变革损益的成分更多。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从思想文化来考察,宋代社会都产生了许多新的内容。两宋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为后人撰修《宋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成为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修史工作已经提上日程。翰林学士承旨王鹗上奏:“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

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元世祖“甚重其言,命修国史,附修辽、金二史”^①。元兵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以后,参知政事董文炳对奉元世祖之命赴临安招降宋军余部的翰林直学士李槃说:“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入,以备典礼。”元朝“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于国史院典籍氏”^②,为日后撰修《宋史》保存了丰富的史料。但是,直至元文宗时期,朝廷尽管“尝命修辽、金、宋三史,未见成绩”^③。究其原因,主要是三史义例无法确定。所谓三史义例,实质上是主张以宋、辽、金三朝何者为正统,何者为闰位的问题。元末杨维禎在《正统辨》一文中指出:

维禎敢痛排浮议,力建公言,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记载,置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鉴之书,传之将来,永示万世不刊之典。……而三史卒无成书者,岂不以三史正统之议未决乎?夫其议未决者,又岂不以宋渡于南之后,拘于辽、金之抗于北乎?吾尝究契丹之有国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广。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诞,中国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于阿保机披其党而自尊,迨耶律德光而其势浸盛。契丹之号,立于梁贞明之初;大辽之号,复改于汉天福之日。自阿保机论于天祚,凡九主,历二百一十有五年。夫辽,固唐之边夷也,乘唐之衰,草窃而起。石晋氏通之,且割幽、燕以与

①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内翰王文康公》。

②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四《左丞董忠献公》。

③ 《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传》。

之，遂得窥衅中夏，而石晋氏不得不亡矣。而议者以辽乘晋统，吾不知其何统也。再考金之有国矣，始于完颜氏，实又臣属于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于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将，而篡有其国，僭称国号于宋重和之元，相传九主，凡立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议者又以金之平辽克宋，帝有中原，而谓接辽、宋之统，吾又不知其何统也。议者又谓完颜氏世为君长，保其肃慎，至太祖时，南北为敌国，素非君臣；辽祖神册之际，宋祖未生，辽祖比宋前兴五十余年，而宋尝遣使卑辞以告和，结为兄弟，晚年且辽为翁而宋为孙矣。此又其说之曲而陋也。汉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兴于汉、唐之前乎？而汉、唐又与之通和矣。……而秉史笔者必以匈奴、突厥为纪传，而以汉、唐为正统。……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阅万世而不可泯者也。^①

当时出现两种不同意见，一派主张赵宋为正统，辽、金为闰位，仿效《晋书》体例，以两宋为纪传，辽、金为载记；另一派则主张效法李延寿《南史》和《北史》体例，以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史，辽、金为北史。双方长期相持不下，历经七八十年而未果，三史迄未成书。

元顺帝时期，元朝政权在元末各种社会矛盾的冲击下，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统治集团急需总结历代兴衰成败经验，为挽救元朝统治服务。至正三年（1343），右丞相脱脱等人重新奏请撰修宋、辽、金三史。元顺帝随即颁发《修三史诏》，其中指出：

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

①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